

经济与社会变迁

系列丛书

主编 吴景平

杨格与国民政府 战时财政

王丽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经济与社会变迁

系列丛书

主编 吴景平

杨格与国民政府 战时财政

王丽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杨格与国民政府战时财政/王丽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7. 1

(经济与社会变迁系列丛书)

ISBN 978-7-5473-1045-8

I. ①杨… II. ①王… III. ①财政史—中国—民国
IV. ①F81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00397 号

杨格与国民政府战时财政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021)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20 毫米 1/16

字 数: 247 千字

印 张: 14.75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1045-8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 (021)52069798

总 序

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里,无论农、工、矿等产业,商贸和运输通讯业,以及财税、金融等领域,无论社会的生产、流通、交换、消费诸环节,都发生过前所未有的变化,涉及的内容广泛、层面丰富、问题复杂,一直是人文社科学者致力研究的对象,不少成果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

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如果仅就生产力的角度看,相比较其他产业和经济事业,近代以来中国的农业变化不大;传统土地所有制和以小农经济为特征的农业制度架构也没有发生重大变革;城市化和工业化使得近代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工农业之间的剪刀差得以形成甚至固化。但是,自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多年里,中国农村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农产品商品化程度逐渐加快;农业的角色转换中,增加了工业原料的供应者和商品的销售市场,农业业态也趋于多样,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在局部地区和部分农业领域已经出现,农村的面貌以及农民的状况,都有了较大的变化,虽然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始终存在着。农业在维系民生上不可替代的地位和支撑国用方面的重要性,社会各界有着越来越多的共识。

中国的近代工业起步于洋务运动,矿业更是有赖于工业市场和近代交通业的兴起。在近代工矿业中,既有业主和雇员的明确分野甚至对立,也有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的采行。在相当长的时段中,工矿、商贸和运输通讯等行业是近代城市形塑进程中的主轴,是城市从业人口构成中的主要部分,近代中国城市往往集经济、政治、文化和中外交往等诸方面功能于一体。但是,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新增城市人口说到底来自农村;而工业化在原料、市场、资金、劳动力等要素方面同

样离不开农业和农民。一方面,乡村与之城市间的差别和联系、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差别与联系,构成了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变迁的重要内容;而另一方面,商业与交通业的发展,既使得上述差别得以凸显,也是缩小差别、强化联系的重要力量。

官商关系,伴生于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变迁的全过程和主要方面。自19世纪的六七十年代的洋务运动起,近代工矿业、交通运输业、通讯事业相继形成和长足发展,官商之间、朝野之间既有分、又有合:军工企业均为官办;民生工业基本商办;新式交通和通讯企业则多为官督商办;新式银行以特许商办(中国通商银行)起步,政府银行则官商合营,政府实际上控股。总体来看,在中国经济近代化起步的时候,官股的主导地位和商股权益之间并没有发生大的冲突。这既与政府的合法性资源依然存在有关,也因为当时针对商人和民间资本的制度安排较为宽松。而到了内外时局激烈动荡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政府逐渐掌握了主要经济产业,国家金融体系得以建立和强化,国家资本和官办企业掌控着经济命脉,这些虽然有助于应对经济危机和金融风潮,并增强了抵御外敌入侵的力量,但另一方面导致了市场关系扭曲,经济运作失序,最终由社会危机引发社会变革。

晚清以降,经济领域新的制度性安排引人关注。与传统的农业和旧式金融业不同,近代工矿业、交通及通讯业和银行业均有准入和运营监管,财税和货制方面的演进更与各行各业乃至所有社会成员紧密相关。进入民国之后,经济领域的制度性建设取得长足的进展并渐臻体系。如果仅就某一经济法规的具体文本而言,似乎都顾及各经济要素的齐全与合理配置,但其运行效果不仅取决于文本的“学理”如何,更受到实际“事理”即市场和社会各方面条件的制约。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关税、盐税和统税改革为例,就整体而言无疑是中国税制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但无论征收、保管还是使用,都会因特定情势而影响其成效;对不同的财税关系方,也会有迥然不同的利害关系;这些财税改革说到底没能帮助国民政府摆脱财政困境和避免财政彻底破产。再分别看看废两改元、法币和金圆券三大币制改革政策,其成败得失,均非其制度性文本铁定,尤其是法币历经抗战八年日趋严重的通货膨胀,但其完全破产则是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的两年后;而在军事败局已定、政治与社会危机全面爆发的情况下,随国民党统治的全面崩溃,包括金圆券在内的任何币改方案的失败,都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史实告诉我们,近代中国经济运行最终目的是服务于社会,而其效果也必须经受社会的检验

判断。

中外关系,是考察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变迁的又一个重要视角。在中国,最早出现的近代意义的工矿业、商业、交通通讯业和金融业,基本上都是外资企业。毫无疑问,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并取得过支配性甚至垄断性地位,对于中国传统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对华资近代工商业的发展确实有过相当的负面作用,这与近代中外之间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列强在华种种特权和势力范围密切相关。但是,除去种种非经济的因素之外,在华外资企业在产品开发、市场开拓、资金获取方式和运用效率等方面的优势,也是刺激与催生近代华资新式企业和经济事业的重要因素。进入民国之后,虽然越来越多产业中的企业数、资金数、从业人员数、所占市场份额等方面,华资企业的发展更快,但华资新式企业包括经营管理在内的基本制度的建构和运行,依然离不开对外资企业先进因素的借镜;外资企业与华资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说到底商品市场必然产物,这种竞争关系在外资企业内部和华资企业内部,同样也是存在的。而从近代中国产业运行与市场的关系来看,在华外资企业与华资企业一样,都是整体意义上的近代中国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而宏观意义的中外经济关系,至少还包括与近代中国直接相连的世界市场、主要的国际行情等因素。事实上,中外贸易和经济往来的发端,远早于近代意义的华资企业萌生之前;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近代转型,离不开与世界市场的密切关系。近代以来中国经济遇到过种种不利的外来因素,如金贵银贱、“镑亏”、世界性的经济萧条、白银风潮等,相关华资企业、产业甚至政府当局都无法回避,只有积极应对一途。而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面临日本扩张及至全面入侵的年代里,维系和扩大对外经济联系,除了固有的外贸属性之外,更有着争取国际援助、拓展外交空间的战略意义。

本《经济与社会变迁系列丛书》业已确定的选题,多为专门性个案研究,有着特定的时间和区域、企业和政府、实际运作和制度供给、实业家与决策者等方面的具体内容,但又都置于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反映出这一变迁的复杂性、多样性。相关的文稿均为作者多年潜心研究的结果,在史料详尽、征引规范、叙事平实、立论公允等方面,都有相当的造诣。除了研究专书之外,本丛书选题范围还包括专题论集、专题史料文献的选编等。我们期待着读者同仁的关注。

吴景平

2015年7月于复旦大学光华楼

目 录

总序	1
导言	1
一、近代中国外籍顾问群体及阿瑟·恩·杨格其人	1
二、从阿瑟·恩·杨格解读国民政府战时财政金融	9
三、时段选择和史料基础	15
四、研究架构和方法	18
第一章 杨格与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之财金应对	20
第一节 杨格所见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之财金因应	21
一、战争资本：抗战爆发初期的外汇统计、转移和增加	21
二、《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	25
三、战争之初财金领域人事制度安排与重要议题	28
第二节 杨格与战争初期国民政府债信问题	33
一、国民政府战前债务解决方案	34
二、抗战初期维持债信的努力及对日关税交涉	36
三、停止偿付外债及其影响	42
小结	49

第二章 杨格与国民政府战时外汇管理	50
第一节 抗战初期的紧急应对与杨格提出权宜之计	50
一、“八一三”前后的法币维持	51
二、抗战初期国民政府高层外汇意见分歧	55
三、权宜之计：《外汇请核办法》	62
四、初步贸易管制——《外汇请核办法》的实施依据	68
五、《外汇请核办法》实施之后的新问题	71
第二节 杨格与国民政府战时外汇平准政策	72
一、中英联合维持法币初见成效	73
二、中英平准基金的订立与初期运作	77
三、平准会第二次停止维持	85
四、1939 年底赴美活动	93
第三节 杨格与中英美平准基金	99
一、随宋子文赴美求援	99
二、劝阻国民政府实行外汇管制政策失败	105
三、居里使华及停止维持上海汇市	110
四、资产冻结——境外外汇管制	112
五、1941 年 8 至 12 月中英美平准基金的初期运作	115
小结	121
第三章 杨格与国民政府 5 亿美元借款运用	124
第一节 杨格对太平洋战争时期汇率调整的建言	124
一、被高估的法币	125
二、加强后方金融管制控制物价	128
三、太平洋战争后期中美之间的汇率之争	133
四、中英美平准基金的结束	137
第二节 杨格和战时美金公债	140
一、战时内债及美金债券方案	141

二、美金债券的发行及失败	146
三、“黄金机会”的错失	153
第三节 杨格和国民政府战时黄金政策	155
一、黄金政策的提出及谈判	155
二、黄金政策的初期效果及严重问题	159
三、解决黄金问题的最终方案	165
四、对黄金问题的总结性分析	168
小结	170
第四章 杨格与国民政府战后财政复兴计划	172
第一节 杨格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筹备	172
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提出	173
二、1943 年《专家联合声明》	179
三、布雷顿森林会议	183
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际作用	186
第二节 杨格和战后中国经济建设策略	188
一、向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申请援助	189
二、战后可支配外汇资源与过渡时期财政	195
三、基于财政平衡的战后中国经济发展政策	199
小结	203
结语	206
杨格年表	213
参考文献	219
后记	223

导 言

一、近代中国外籍顾问群体及阿瑟·恩·杨格其人

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等各领域的进程,都不再呈全然封闭状态,而是充满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交流和碰撞。在此过程中,有一个新鲜而庞杂的特殊群体——来华外国人士登上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从最初的传教士到专业顾问人士,从高层政治人物到新闻记者,再到不起眼的普通人,与之相关的历史文献以及史学界的研究均充分表明,该群体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参与和影响无可否认。^①

比较而言,海外学界对来华外籍人士的关注早于国内学界,如西人云先·克鲁宁撰写《利玛窦传》。^②台湾地区的相关研究,早期以台湾梁敬镛所著《史迪威事件》为代表。^③大陆学界对该群体初具规模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70至80年代。8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撰《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收录1840—1949年来华外籍人士姓名及事略约2000条,^④迄今为止仍然是最完备的来华外籍人士人名辞典。继而,学界从不同角度对特定人物、特定事件进行开拓性研究,譬如汪敬虞对赫德(Robert·Hart)与中国海关、中外关系的研

① 相关研究成果众多,较具代表性者如尚丛智:《传教士与西学东渐》,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史景迁:《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温洽溢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戚厚杰主编:《洋顾问列传》,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日]矶野富士子整理:《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Robert Bickers, *Empire Made Me—An Englishman Adrift in Shanghai*, Penguin books 2004.

② 参见 Vincent Cronin:《利玛窦传》,思果译,光启出版社1982年版。

③ 参见梁敬镛:《史迪威事件》,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

④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究,又如熊月之等人在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中注意到傅兰雅(John·Fryer)、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等西学传播者。^①

21世纪以来,随着一手资料文献的不断开掘,尤其是海外史料进入国人视野,上述研究有了推陈出新的史料基础。然而,就近代来华外籍人士的整体数量来看,目前的史料整理和研究均只是一小部分。各路外籍人士的来华动机、在华经历及其影响,无疑应具体考察、分而论之,无法由一本专书囊括全部。

现有研究显示,来华外籍人士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多维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作用并不是单向度的。近代中国经历了从晚清到民国的巨大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也在努力吸收外力,加快民族国家塑形及现代化进程。从晚清到民国,中国政府雇佣外国人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国际化程度愈来愈高。尤其是在国民政府时期,来自苏联、德国、美国、英国,甚至国际联盟的许多外国专家以官方、半官方或个人的名义在政府部门供职——即所谓“外籍顾问群体”,提供专门技术援助和专业咨询,发挥着广泛作用。这无疑提示研究者,对来华外籍人士的研究不仅可以作个体性的考察,还存在以国民政府为主体的另一个视角——即在官方或半官方的背景下,雇佣外籍专业人士如何成为一种惯例?中国如何吸纳并通过这些具备专业技能的外籍人士来解决实际问题,或架起中外联结的桥梁?这些外籍顾问带着何种动机或理想来到中国,以及他们在华工作和生活作何观感和反馈?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本书的研究对象——国民政府美籍财经顾问阿瑟·恩·杨格先生,^②在1929—1946年间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首席财经顾问,也是目前官方记录当中除了英籍人士赫德以外在中国政府任职时间最长的外籍人士。在学界,杨格多以其三本有关国民政府财政经济问题的英文著述闻名,但对他个人生平事迹和在华经历依然缺乏了解。笔者先将其生平及其与中国的渊源做一勾勒,再对相关研究现状进行梳理。

杨格(Arthur N. Young,亦称杨亚德、杨爱德),1890年出生于美国洛杉矶市。本科毕业于西方学院(Western College),继而到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深造,1914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杨格任教于普林斯顿大

^① 参见汪敬虞:《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② 作为本书的研究对象,在正文叙述中本应该用“杨格先生”称之,为表达流畅和节约篇幅,下文注释及正文中均直接称呼为“杨格”。

学,后从事国际财政事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赴欧洲致力于战后财政秩序恢复。之后分别应聘为墨西哥税务顾问(1918)、洪都拉斯财政顾问(1920—1921)。1921年回美,在国务院经济部门供职。八年之后,杨格接受其老师,亦即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甘末尔(Edwin Kemmerer)邀请,以债务专家身份作为甘末尔顾问团成员来华。该团结束任务之后,继以个人名义受聘为国民政府财政顾问,直到1946年离华。

通过上述简要介绍,不难看出杨格是国民政府大陆统治时期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按照民国史研究的一般划分,其在华工作17年(1929—1946)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即1927—1937十年发展时期和1937—1945年中日战争时期。其身份虽然一直都是国民政府财政顾问(1946年短暂担任过中央银行顾问),但由于前后两个阶段环境变化显著,杨格所从事的具体工作内容差别较大。

抵达中国之初直至抗战前夕,杨格参与解决国民政府财政金融领域各类重大问题,如对外债整理、税务整顿、政府与银行关系等,其中不乏棘手的现实问题。从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制度建设来看,他与其他外籍顾问试图通过对西方财政金融制度进行移植,协助中国建立现代化的中央银行制度、货币发行制度和财税制度。杨格在很多问题上多有建言,并先后受到宋子文和孔祥熙两任财政部长倚重。

在战前工作中,杨格的工作重点是利用其专长协助国民政府整理内外债,尤其是国民政府所继承的北京政府外债。1929年甘末尔顾问团在华期间,杨格就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外债问题进行过专题研究,提出整理方案。留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顾问之后,先是尝试过全盘整理债务的方案,后又提出财政部经管、财政部和铁道部共同经管积欠外债的办法。经过几番整理,成效斐然,十年间国民政府“共有约等于2.75亿美元的债务得到清理。所有中国债券的牌价都大见提高。到了1937年6至7月间,最好的中国债券在收益率为5%上下的基础上交易。这比同类的日本债券声价更高。到了这时大多数拖欠未还的旧债,业已清理。除去欠日本的债务,须待日本改变它的对华政策和行动才能处理之外,剩下的对外债务不久定会全部清结”。^①

南京国民政府所继承的外债得到良好清理,巩固了既有债信,也为其打开了

^① [美]阿瑟·恩·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陈泽宪、陈霞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61页。

向西方国家另辟新债的一扇门。1933年国民政府向美国金融复兴公司商借5 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正是宋子文在杨格的襄助下完成的。杨格这样评价自己在该时期的工作:“两次整理债务方案所依据的都是我的建议。我那时觉得,现在仍然觉得,我在中国作出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设计了使债务的整理能在最小限度的损失下顺利进行,并且能在短暂的间歇之后,接着就是使信用提高的方案。”^①

杨格对战前十年国民政府财经改革评价甚高,他曾做过如下整体性评价:“过去十年来的改革,足与美利坚合众国早期采取的财政措施相比。”^②作为财经顾问,杨格显然并非国民政府财政事务的决策者,但他取得了前后两任财政部长以及中央银行总裁(如宋子文、孔祥熙、俞鸿钧、贝祖贻等),甚至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政府高层决策人的充分信任。在日常工作中,他和徐堪、陈行、贝祖贻、席德懋等财政金融部门要员保持密切往来。在其任内,国民政府在财政金融领域诸多重大决策,杨格都参与讨论,提出意见。与此同时,他与美国官方的稳定关系和与商界的良好沟通,让他在对美财经事务中扮演了比同时期其他顾问更为重要的角色。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杨格继续以财政顾问的身份留任,带有一定的偶然性。1937年中,杨格心生辞职回美之意。他曾这样写到此时的个人打算:“及至1937年,政府越来越能有效地处理财政问题。我认为该是设法结束我的工作的时候了。1937年春季我谈妥缩短服务期限办法,任何一方(国民政府和杨格本人——作者注)都可以在90天前结束合同。我觉得币制改革业已成功,国内公债结构的改组和清理旧欠外债的工作都进展顺利,已经使得我可以离去。而且,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浓厚,我以早些脱身引退为佳。可是,一当战争开始,我就感到自己有义务在战争期间留下。”^③做出该决定之后,杨格留在上海协助国民政府转移外汇储备,并加入智囊团为战时财政之应对积极提供建议。随着战事推进,杨格随国民政府从上海迁往南京,后迁往武汉,辗转至重庆。期间曾短暂赴美公干或探亲,间或赴昆明、成都、香港等地考察,直到抗战胜利后返回南京。

① [美]阿瑟·恩·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陈泽宪、陈霞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7页。

② 同上,第472页。

③ 同上,第462—463页。

抗战爆发之后,大量外国人士纷纷离华,杨格的上述经历并不寻常。他目睹并经历了八年苦战给中国造成的创伤和痛苦,也让他对中国抗战事业给予巨大的同情和深刻的理解。他指出,中国在抗战前期独自抵抗强敌,很少从外部世界得到援助。国民政府西迁到重庆之后,中国政府失去了很多税收基地和有经验的财政人员。后方的“社会经济结构本来十分单薄,是经不起如此沉重压力的。全国遭到无法计算的损伤,还备受势如脱缰之马的通货膨胀折磨。这些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都会酿成贪污腐化和降低行政效率”。^① 在另一本书中,杨格则指出“中国的抗战差不多是一个奇迹……令人惊奇的倒不是出现失败和种种丑闻,而是国民政府竟然能够度过战争。”^②

随着大撤退带来的生活颠簸和工作环境恶化,杨格和很多政府人员一样,在艰苦的条件下承受了比战前更大的工作压力。在抗战时期,杨格对战时货币、外汇等重要问题均有建言,而且主张鲜明。其中最重要者是坚决维持法币在沦陷区的流动性及其可兑换性。有关这一主张,杨格在战争各个时期有不同表述。

1937年八一三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内部即有放弃法币之说,这种观点为杨格等人坚决所阻。他指出,维持法币可以有效地向国际社会宣布中国抗战之决心,并通过货币让沦陷区人民始终认可国民政府,弥补抗战初期军事败退所带来的负面评论和人心动荡。随着国民政府节节撤退,在沦陷区维持法币的可兑换性,固然维持了国民政府货币信用,但该政策大量损耗外汇资源,遭到批评。杨格依然认为,在战时难有两全的情况下,应该坚持维持法币——虽然杨格在其专书中鲜有涉及抗战初期的对日外交问题,但从其货币政策的主张加以推断,杨格当是国民政府阵营中的主战派人士。

在坚决维持法币的前提下,杨格主张中英、中美之间在货币领域展开密切合作,多次向财政部长孔祥熙建言建立并维持中英平准基金以保证法币的可兑换性。为此,杨格在战时求援最艰难的时期,分别于1939年和1940年两度赴美积极游说美国加入平准基金,增加对中国货币的支持。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国民政府基本维持了法币的可兑换性,并建立了平

① [美]阿瑟·恩·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陈泽宪、陈霞飞译,第3—4页。

② Arthur N. Young,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 6—10. (因本书在文中引用频仍,后文注释中统一简化,只写书名和页码,特此说明。)

准基金模式,实现法币相对稳定地贬值。换言之,国民政府高层虽有迟疑,但对杨格的相关意见基本采纳。1941年4月,中英美三国平准基金成立。按照杨格等人的制度设想,如果延续中英平准基金的运作模式,中方应该继续维持法币的可兑换性,在市场上觅得其对应的价值。但是随着国民政府高层关于外汇问题的争论日益升级,以孔祥熙为代表的官员趋于保守政策,即维持固定汇率,全面实行外汇管制。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虽然中英美平准基金仍维持名义上的运作,但国民政府放弃维持沦陷区法币,在后方采取固定的官方汇率。杨格有关战时货币的建言逐步失效。

杨格在战时的另一显著贡献,是积极协助国民政府开展对美求援,并参与其运用。抗战爆发之后,杨格便出于财政顾问之职责和对中国抗战事业的同情,以半官方或个人的身份与美国驻华大使馆詹森(Nelson T. Johnson)、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官员霍恩贝克(Stanley K. Hornbeck)等人加强沟通,力争打开美国对华援助的通道。1941年6月至1942年6月,杨格作为宋子文的主要助手之一赴美求援,获取金属借款、平准基金借款等多项外援。同年8月,经仰光回到重庆,继续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顾问一职。值得一提的是,在返回重庆之前,杨格曾拒绝了宋子文让其加入新成立的国防供应公司的邀请,表示希望能够运用其专长继续回到重庆工作。

回到大后方后,杨格直接参与了太平洋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美援运用,如策划“美金节约建国储蓄券”和“同盟胜利美金公债”。在这两项债券的发行过程中杨格又推动美国对华运输黄金,抑制后方通货膨胀的方案。现有资料显示,上述方案经过多方讨论,都曾被寄予厚望,但最终收效不佳。在这一过程中,杨格观察并记录了国民政府战时财政体制的诸多弊端。他指出,战时财政的深刻失败被历史的种种偶然所遮盖,如1943年和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曾两度出现货币崩溃之势,却先后因同盟国良好的战争前景和日本突然投降而避免。换言之,在中国“竟然”度过战争的“奇迹”背后,货币金融和财经领域都蕴藏着极大的危机。这些危机,在战后局势的风云变幻之中一一迸发,铸成了国民政府走向失败的不可逆因素。细细检视杨格笔下国民政府在战时财经领域的表现,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状况。

第一阶段,即抗战第一年。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独力难支,却以战前财经改革成绩和抗战爆发前夕对美出售白银换取外汇的政策为基础,在抗战第一年交出了满意的答卷。最重要的表现在于国民政府对法币的有效维持。这是中方在财

经领域的重大胜利,直接粉碎日本迅速灭亡中国的计划。就外交意义而言,国民政府此一做法实际上是在维持英美各国的在华利益,为争取外来援助奠定至关重要的基调。

第二阶段,随着全面抗战展开,国民政府试图实施“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苦求外援但实际获得数量有限,可用于货币领域的资金甚微。1938年从中英金融机构合作的实际经验当中摸索出来的平准基金模式,一直沿用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即中英美平准基金正式投入运作。以此为标志,国民政府在财经领域内的苦撑待变似乎迎来了转捩点,与英、美等国建立了合作平台。但这一阶段,国民政府内部深层次的问题逐步暴露,高层分歧日渐明显,货币金融领域诸多危机浮现,如物价从1939年之后持续高涨,呈现出无力控制的态势。对于外援,杨格这样评述:“(抗战初期——作者注)中国独自抗拒一个力量比它强大得多的敌人,很少从外部世界得到援助。即使在珍珠港事变之后,中国有了盟友的时候,外援也是数量微小,而且来得太晚。”^①

第三阶段,即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直到战争结束。杨格认为在获取大量外援之后,国民政府获得了自身财政平衡及根本改善后方经济状况的契机。然而,事实证明国民政府并没有使财经问题得到全局性改观。相反,日益失控的物价、固定汇率所引起的法币内外价值偏差越来越大、因美军在华开支问题而引起的外交纠纷,导致国民政府所面临的财经形势每况愈下。围绕此一时期中美在财经领域的合作与纠纷,杨格指出,中美双方在太平洋战争时期本有建立深层互信合作的机会,但是双方均未恰当把握。在国民政府内部,除了伴随战争而来的行政效率大幅下降之外,“腐败达到了不可宽恕的地步,已不是可以用通货膨胀和混乱作为借口的”。^②就美国而言,战争后期美国对远东战场的价值评估及其所主导的各种经济建设方案、国际金融秩序,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国情。这也是抗战结束前夕和战后初期国民政府统治危机迭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以上便是杨格在华的基本情况。目前学界尚无研究杨格的专著,对其生平史实最为全面的概括当推 Edward L. Rada(爱德华·L.拉达)教授所写的文章——*Arthur N. Young and Nationalist China's Finance*(《阿瑟·恩·杨格与中国民族财政》)。该文序言部分简单交代了杨格的基本履历,主体部分按照时

① [美]阿瑟·恩·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陈泽宪、陈霞飞译,第3页。

②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 p. 423.

间顺序即战前、战时和战后三段叙述,分别介绍杨格在不同时期的工作内容。从这篇文章可以了解到,杨格在战前的工作集中于1930—1932年债务调整,1933年争取美国棉麦借款和1935年前后货币改革。战时杨格的关注点在于货币政策、平准基金及5亿美元之运用。对于战后问题,杨格重点参与过战后货币制度设计、战后财政援助计划。值得一提的是,该文指出杨格对战后台湾的建设亦有贡献,他曾于1958年初访问台湾,为台湾当局的财政改革提供了五点建设性意见。该文在结论中对杨格做出如下评价:“杨格不仅仅是对政府发表建议的财政顾问,在必要的时候,他也是奋斗在第一线的战士。”^①从研究的角度而言,该论文篇幅有限,且参引资料仅限于杨格本人的著述,并未使用一手文献,故而多有拓展空间。

关于杨格担任国民政府财经顾问的早期经历,还可以在对甘末尔顾问团的研究中找到记载,如Paul B. Trescott撰写的*The Money Doctor in China: Edwin Kemmerer's Commission of Financial Expert*, 1929。该文侧重于杨格在战前的活动,指出其对国民政府的贡献在于借助与美国政府,尤其是与国务院的良好关系,为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棉麦借款作出贡献。^②

将上述西方学界的相关成果与杨格在华活动进行简单对照即可发现,现有叙述仍属粗线条勾勒,在性质上偏向描述而非研究。将目光投向中国学界,已出版的文史资料对杨格最早的关注是20世纪80年代资耀华在其回忆录——《国民党政府法币的崩溃》中指出“(战后)宋子文勾结杨格开放外汇市场”,“宋子文当时能够上台(担任行政院长一职——作者注),是利用杨格所开的20亿美元大借款的空头支票;而杨格为了满足美籍商人的要求,极力主张开放外汇市场。所以宋一上台,即执行杨格的意旨,由行政院正式颁发‘开放外汇市场案’、‘中央银行管制外汇暂行办法’及‘进出口贸易暂行办法’”。^③在这篇回忆录中,杨格成为内战时期国民政府各种财政政策的始作俑者,导致国民政府该时期在外汇、货币等方面出现重大失误。这一评价是否公允,战后国民政府财经改革究竟是

① Edward L. Rada, *Arthur N. Young and Nationalist China's Finance*, The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January 1981.

② Paul B. Trescott, *The Money Doctor in China: Edwin Kemmerer's Commission of Financial Expert*, 1929, *Research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and Methodology*, Vol. 13, 1995, pp. 125-158.

③ 资耀华:《国民党政府法币的崩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页。